

沟口雄三著作集

沟口雄三
著
作为方法的中国

孙军悦译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沟口雄三著作集 孙歌 主编

孙军悦 译

沟口雄三 著
作为方法的 中国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Houhou to shiteno Chugoku

Copyright © 1989 by Yuzo Mizoguchi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arranged with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为方法的中国 / (日) 沟口雄三著; 孙军悦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7

(沟口雄三著作集)

ISBN 978-7-108-03605-6

I. ①作… II. ①沟…②孙… III. ①中国—研究 IV. ①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3851号

责任编辑 曾 诚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张雅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7月北京第1版

201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 9.625

字 数 184千字

印 数 0,001—7,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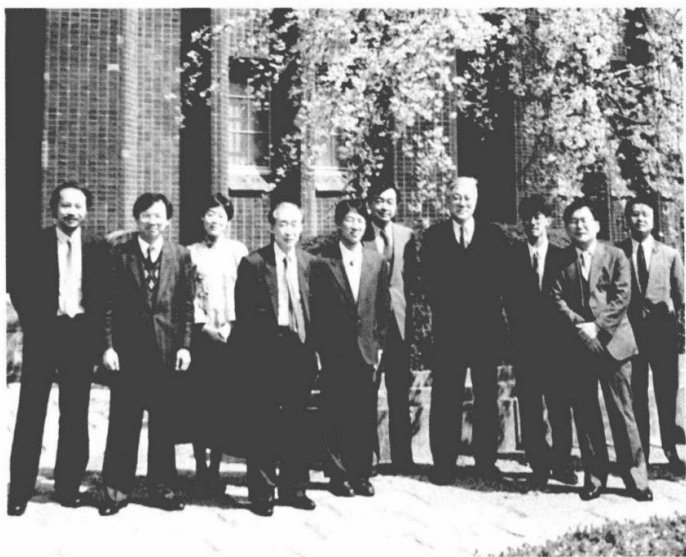
定 价 36.00元

溝口雄三

方法としての中国

東京大学出版会

《作为方法的中国》日文版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9)



沟口雄三(左四)与池田知久(右二)、户川芳郎(右四)和佐藤慎一(右五)等同侪在东京大学

目 录

第一部

- 第一章 考察“中国近代”的视角 3
第二章 关于近代中国像的重新探讨 33
第三章 中国的“封建”与近代 84
第四章 天下与国家、生民与国民 117

第二部

- 第五章 作为方法的中国 125
第六章 津田支那学和今后的中国学 134
第七章 法国支那学、日本汉学和中国哲学 149
第八章 写在“儒教复兴”之际 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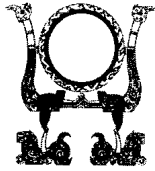
第三部

- 第九章 被扭曲的近代中国像
——洋务与民权、中体西用与儒教 187
第十章 一个反“洋务”派的记录
——关于刘锡鸿 252

本书主要相关人物表 280

后记 282

附录 中国如何成为方法 孙歌 293



第一部

第一章 考察“中国近代”的视角

亚洲正在发生巨大的地壳变动，尽管速度缓慢。一个置身于亚洲四小龙的包围之中不得不对自身的经济“落后”开始有所省悟的中国，正呈现在我们中国研究者的面前。

被称为“十年动乱”或“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其给经济带来的巨大打击^{〔1〕}仅次于中日战争。从此舞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从政治主义、原理主义的时代步入了经济主义、现实主义的时代。

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尤其是在1960年的安保

〔1〕据1987年1月5日香港《文汇报》称，“大跃进”和“文革”造成的损失达到6200亿元人民币，折合日币约25兆日元。“文革”前后及近年的统计数据请参考下表。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社会生产总值	2679	2695	3800	5379	8531	16588
国家财政总收入	572.3	473.3	662.9	815.6	1085.2	1866.2
国民收入	1220	1387	1926	2503	3688	7031

单位：亿元。参照《中国统计年鉴》1988年版（中国统计出版社）。

斗争中，中国曾经是台前幕后的主人公，然而现在却退为背景，成为亚洲四小龙成功背后的陪衬，尽管仍然让人有些心怀畏惧。

中国在“文革”前后的巨大变化，使那些从“文革”之前就开始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们困惑不已，当然，他们对“文革”本身就困惑不已。

就我个人而言，我怀着五分批判（对于无原则的夺权抗争和错误的政治路线）、三分困惑（对于破坏了我心目中中国革命形象的日趋严重的现实状况）、两分共鸣（对于尽管如此仍试图在延安重新找回革命原点的主观主义意图〔浪漫主义〕），一直关注着“文革”的动向。也就是说，我也绝不是什么值得表扬的人。至少我没有公开表明自己反“文革”的立场，也无意去批判那些在日本挥舞着“文革”大旗，为毛泽东、林彪抬轿的所谓“文革”追随派。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也是受到中国革命的影响而走上中国研究道路的人，在这一过程中我内心逐渐形成的对中国革命的憧憬本质上和那些“文革”追随者是相同的，所以在没有挖掘出自己内部的问题之前，原理上我无法仅仅从政治的角度来批判他们。

总而言之，我和很多与我同辈的人所共有的战后的中国认识或中国观必须得到反思。如果不走出这一步，无论是亲“文革”还是反“文革”最终都不过是对现象的追认而已。换言之，战后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视野被局限在了太平天国之后的革命道路上，如果我们不把其扩

展到近代以前，从综合性的或者说长期性的视野出发，确立一个俯瞰和细察中国革命的角度，那么就连对“文革”都无法作出历史性的、构造性的批判——这是我在“文革”动乱中的想法，在这里我想重新探讨一下。

1

我们这些在战争期间或战后成长起来的中国研究者，最初对中国几乎都不具备批判性的眼光。毋宁说，对曾经因为批判、蔑视中国而自动参与了中国侵略的战前或战时的研究者，如津田左右吉等人的近代主义中国观进行否定、批判或排除才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力的批判根据便是竹内好在《鲁迅》以及《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2]等著作中所表达的中国观。也就是说，一方面对日本的所谓“脱亚”的近代主义进行自我批判，另一方面把中国推向和日本相反的另一个极端，看做是亚洲理想的未来而憧憬不已。简而言之，我们的中国研究基本上都是从“憧憬”出发的。这种憧憬的对象是在各种日本内部的自我意识——即和日本近代百年历史相关的种种“反”或者“非”日本意识——的对立面所形成的一种反自我意识

[2] 竹内好《鲁迅》（未来社，1961），《中国的近代と日本の近代——鲁迅を手がかりとして》（东京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编《東洋文化講座》第三卷《東洋的社会倫理の性格》，1948年。后收录于《竹内好評論集》第三卷《日本とアジア》，筑摩书房）。

的投影，所以从一开始便是主观的。这种憧憬的对象并不是客观的中国，而是在自身内部主观成像的“我们内部的中国”。所以这一“中国”才能够彻头彻尾地成为日本近代的反命题，其之所以成为憧憬的对象是因为它本来便是作为憧憬的对象而形成的。

并且，日本的脱亚—兴亚只构成了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侵略，而在中国却不仅确立了亚洲自身的抵抗的主体，而且还诞生了社会主义中国。随着这一历史事实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战争责任、赎罪意识以及对于日本战后新的反中国政策的批判等要素也开始包含于日本内部的自我意识中，于是“我们内部的中国”逐渐被内面化，“憧憬”式的自我否定的构造也日益深化。从历史上来看，这种自我否定的构造至少在战后二十年里反而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然而随着这种自我否定被逐渐地内面化、深入化，我们自以为只要不停止反法西斯、反侵略，或者说联合亚洲人民的各种活动，就可以获得主体性，而这种主体化尽管有所保留，却使我们感到能够把自己的研究课题和如何来变革“我们内部的日本”的课题结合起来，并深信这正是超越战前和战争时期的体制内中国研究的途径。现在再来回顾，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仍然无法否定其积极的一面。

但同时我们也无可否认，建立在与“中国近代”的关系上的自我否定式的憧憬构造，也使我们的反脱亚、反近代主义或者说亚洲主义式的主体变成了主观因而也

是脆弱的主体。我们没能在历史上把中国的近代客观化，与此同时，也没能在历史上将日本的近代客观化。这种倾向的理论根据便是上述竹内好的《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

众所周知，竹内在这篇文章里，把日本文化称之为转向型，相反地把中国文化定位为回心型。他写道：“回心源于保持自我，转向始于放弃自我。回心以抵抗为媒介，转向没有媒介。”保持自我和放弃自我是对欧洲侵略亚洲的两种不同反应。他认为，日本只将新的东西不断地层层叠加而不作任何“构造”上的变革，不经过抵抗就接受了欧洲，只一味地要成为欧洲；与此相反，中国却以“构造”为抵抗而不断受挫，因为持续的挫折感而不断抵抗，换言之，也就是固执于自我，并因为固执于自我而不得不进行自我变革。因此，当竹内写道：“看来东洋通过不断地抵抗，正在赶上欧洲、超越欧洲，创造出非欧洲的东西”时，他所说的“东洋”指的仅仅是中国。而日本却与此相反，在没有抵抗这一点上缺乏东洋特质，在没有保持自我的欲望这一点上又缺乏欧洲特质，他甚至说道：“换言之，日本什么也不是。”

对于脱亚式的近代主义的这种嗜虐性或者说受虐性的批判视点，据竹内自己所说是与鲁迅（1881—1936）的相遇中获得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批判试图从“鲁迅 = 东洋”的角度，把当时根植于日本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对欧洲的自卑感和与此互为表里的

日本浪漫派式的国粹主义心情，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亚洲的优越感，作为普遍存在于日本人的近代意识中的耻部来加以暴露。另一方面，这一批判也是在意识结构的深层对日本侵略亚洲尤其是侵略中国的历史所做出的自我批判。自我批判透过“东洋”的视线成为了全面的自我否定，也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位于亚洲的日本近代的先进性和优越性。正因为此，竹内的观点在战后不得不开始关注亚洲新动向的我们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并在思想上深化了我们对战后日本的亚洲政策的批判。

日本从“东洋”的角度来看“什么也不是”，与此相反，新中国却被认为正在“超越欧洲，创造出非欧洲的东西”——在当时新中国诞生并正在不断朝着社会主义深化革命的情况下，这一崭新的中国形象作为新中国的现实而无条件地被我们接受了。也就是说，这一中国形象作为一种先验性的观念或多或少已经存在于我们战后的中国观以及中国认识之中。而正因为事先已经有了这样一种先验性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对团结亚非的社会主义中国又产生了新的自我否定（否定跟随美国的资本主义日本）式的憧憬构造。

然而，毋庸赘言，一般来说，一个全面否定或者全面肯定自己的历史、无法将自身相对化的人，也不可能客观地、相对地来看待他者。

的确，近代日本由于没有从固有的、内在的价值基准来把握各民族的文化，把欧洲近代看做是普遍的价值基准而将各民族文化一元地根据这一标准来衡量，从而

对亚非诸国产生了先进意识和优越感，从这一点来看，是反历史因而也是不公正的；但因此就把日本的近代说成“什么也不是”而加以全面否定同样也严重违背了历史的逻辑。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各自的近代到底是如何以各自的前近代为基体的？建立在前近代基础上的近代和欧洲的近代相比，又在哪些方面具有独特性？换言之，日本和中国是如何背负着各自固有的过去的？即便是否定性的继承，这一继承又是如何制约着现在的？如果从上述违背或缺乏历史性的观点出发，我们不可能客观地、历史地来把握这些问题。

2

中国由于旧的统治阶级对新的局面缺乏适应能力而遭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蚕食，但也正因为此，反而使反对帝国主义支配的民族主义运动不得不同时承担彻底变革旧社会 = 政治体制的任务。……反帝运动和社会革命的结合……成为了中国民族主义一贯的传统。而日本呢？打倒德川体制、掌握了统一国家权力的仍然是封建势力本身。只不过他们由于需要对抗西欧各国的压力而迅速地解消了国内多元的封建分权制，将权力统合于天皇的权威之下，……实现了自上而下的近代化。……民间的民族主义运动除了二、三特例之外……不但没有和社会革命相结合，反而和反革命、反民主

主义相结合了。

——丸山真男〔3〕

的确，中国和日本不同，不具备追随西欧型的条件。但中国并没有去弥补这一条件的欠缺，而是将欠缺积极地转化为了理想、力量。这便是孙文所说的“王道”。

——竹内好〔4〕

近代化的日本不断侵略中国，……而被侵略的中国，正是在近代化方面一片虚无空白的、活生生的人民因为“人需要生存”而起来抵抗，……终于凝聚了强大的力量打败了近代化的日本。……此时的中国人民是赤手空拳的人民大众，无论用固有的传统武器，还是用外来的近代文化都无法保卫自己。

——西顺藏〔5〕

日本的近代化走的是一条由旧统治阶级领导的自上而下、因而也是没有经过社会革命、追随西欧的帝

〔3〕 1950年丸山真男在太平洋会议上提交的报告《アジアの民族主義——ラクノウ会議の成果と課題》（岩波书店，1951）。引自竹内好《中国の民族主義》，参见注4。后经修正，改题为《日本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ルリズム》，收录于《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未来社，1957）。这里为了解丸山在五十年代的问题意识，所以特意引用了首次发表的原文。

〔4〕 竹内好《中国の民族主義》（岩波讲座《現代思想》第三卷《民族の思想》，1957。后收录于《竹内好評論集》第一卷《新編現代中国論》，筑摩书房）。

〔5〕 西顺藏《無からの形成——“われわれ中国人民の成立”について》（《展望》复刊第一号，1964年10月。后收录于《中国思想論集》，筑摩书房）。

国主义道路，与此相反，中国的近代化走的是自下而上的反帝反封建社会革命、即人民共和主义的道路——这一观点至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基本上是一个共识。

“和现代化了的日本相反，落伍于现代文化世界的是支那”（津田左右吉《什么是东洋文化》，收录于《支那思想与日本》，岩波新书）——顺便补充一句，津田把“现代文化”亦称为“世界文化，即所谓西洋文化”——这一类战前的中国认识在这一时期和“先进—落后”的模式一起被彻底排除，先进、近代的日本因其反民主主义、帝国主义的本质而成为了被否定的对象。

在近代化方面一片空白、本应是落后的中国反而将其空白化为动力，自我更生地实现了世界史上史无前例的全新的第三种“王道”式的近代——这一新鲜的感动构成了战后中国观的基础。

把中国的近代看做是自我更生式的近代这一观点是将“落后”正当化，即通过推翻“先进”的根据来否定“先进—落后”这一欧洲一元化的思维方式。看起来是全面否定，但正如后文所述，由于这种否定是在一旦进入了“先进—落后”这一模式之后所进行的自我正当化的否定，而并不是站在这一模式的外部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否定，因此在方法论上仍然不够彻底。

换言之，把缺乏追随西欧的条件的“无”看做是一种“欠缺”或“虚无空白”，并把“无”看做为“转化”的动力，使我们从一开始就远离了另一种认识的可